

中国廉政史鉴

思想理论卷
①

李洪峰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中国廉政史鉴

李洪峰题

思想理论卷 ①

李洪峰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绪论

李洪峰

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，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的一脉清泉，源远流长，清静明澈；在今天，仍然极富教育意义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。

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，概括言之，可以分为三个方面，即思想理论、典章制度和历史人物。这三个方面，都包含着极为丰富、厚重的内容，充实而有光辉，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成就。为了弘扬伟大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，为加强廉政文化提供有益借鉴，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梳理。

一、 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

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资源博大精深，“百川异源，而皆归于海；

百家殊业，而皆务于治”^{〔1〕}。其中廉政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论题。

“廉”，最初指官员应具有的品德之一。舜时代提出从政者要有九种品德：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。”^{〔2〕}“简而廉”，意思是“性简大而有廉隅”，即性格豁达而又行为端方。

到西周时，“廉”作为官员一种必备的品质纳入考察考核。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。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^{〔3〕}“廉”在此当为坚持原则的意思。后来唐朝的贾公彦注释这里的“廉”字时说：“廉者，洁不滥浊也。”^{〔4〕}不过，廉狭义固定为“廉洁”之意是在春秋时期。管仲提出：“国有四维……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”^{〔5〕}这四维，都是指遵守法度、不逾规矩。晏婴曾提出：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，“廉之谓公正”，^{〔6〕}“故圣人伏匿隐处，不干长上，洁身守道，不与世陷乎邪，是以卑而不失义，瘁而不失廉。”^{〔7〕}凝而聚之，“行廉而不为苟得”^{〔8〕}作为一种品德内涵趋于固定，廉洁而不贪的意义明晰而特指了。

战国时，廉洁与不贪的意义固定下来。屈原说：“朕幼清以廉洁兮。”^{〔9〕}东汉人王逸注释说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。”这应该

〔1〕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。

〔2〕《尚书·皋陶谟》。

〔3〕《周礼·天官冢宰·小宰》。

〔4〕《周礼注疏·天官冢宰》。

〔5〕《管子·牧民》。

〔6〕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。

〔7〕《晏子春秋·内篇问上》。

〔8〕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。

〔9〕《楚辞·招魂》。

符合屈子的本义。韩非子讲：“百官之吏，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，必曰：‘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，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，是犹上高陵之颠，堕峻溪之下而求生，必不幾矣。’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，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，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？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，下得守其职而不怨。此管仲之所以治齐，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。”^{〔1〕} 韩非子明确提出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臣僚清廉方正，而不是放纵贪污之心以徇私枉法。

因此，廉政的内涵在廉正与廉洁之间。廉政，在国家层面，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；对官员个人，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。廉政的思想观念，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；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，是在王朝建立之后。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，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理念：民本、德治、任贤、治吏、明法、勤政、节用、教化。

（一）古代的民本思想

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倡导的从政价值理念。价值观是思想的灵魂，民本观念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。

夏启废禅让建立家天下，宣扬“有夏服天命”^{〔2〕}的天命观。但是，夏启的儿子太康即位后就沉迷游乐，不理朝政，结果被放逐。是时，《五子之歌》讽之曰：“皇祖有训：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^{〔3〕} 这是关于民本思想的第一次呐喊。夏商相继覆亡，西周汲取前两朝的政治教训，提出“敬德保民”、

〔1〕《韩非子·奸劫弑臣》。

〔2〕《尚书·召诰》。

〔3〕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

“以德配天”，所谓“聿修厥德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”^{〔1〕}。其中“德”包括敬天、敬宗、保民三方面，尤其要“怀保小民”^{〔2〕}，舍此难保天祚。

春秋战国的动荡，彰显了民心向背的力量。“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”^{〔3〕}，“唯人是保，而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。”^{〔4〕}于是，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^{〔5〕}。孟子继而提出了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^{〔6〕}的政治秩序理论，要求统治者须有“忧民之忧”及“与民同乐”的思想境界，有解民于“倒悬”的政治作为，建立“恒产”的产权制度以保障民生。荀子则更进一步提出“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；天之立君，以为民也”^{〔7〕}的立君为民权力观。至此，先秦民本思想基本形成。

先秦民本思想具有通过制民巩固君权的政治立场。孔子讲仁政，要富民教民，归根结底是为了“使民”。孔子说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^{〔8〕}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基础。孔子又说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”^{〔9〕}民众是国家的军事基础。孔子还说：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”^{〔10〕}民众是国家的政治基础。儒家讲教化，但是它极其明确的立场却在

〔1〕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

〔2〕《尚书·无逸》。

〔3〕《道德经·第三十九章》。

〔4〕《孙子兵法·地形篇》。

〔5〕《论语·子路》。

〔6〕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。

〔7〕《荀子·大略》。

〔8〕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〔9〕《论语·子路》。

〔10〕《论语·阳货》。

于,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^{〔1〕},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;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”^{〔2〕}“君者,舟也;庶人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。……故君人者,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。”^{〔3〕}这都是讲君主是为治主体,民众是治理客体,客体是基础,搞得不好客体就要颠覆主体。从秦始皇到汉武帝,封建专制制度在全国最终确立起来。应该说,封建君主政治正是植根于民本思想的上述政治立场,才把它作为治国策略思想。董仲舒发现了这一奥妙所在,指出“唯天子受命于天,天下受命于天子,一国受命于君”,“君者,民之心也;民者,君之体也。”^{〔4〕}汉武帝欣赏君权天授原则基础上的民本思想,实行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民本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,奠定了君主集权制民的基石,也派生出天子与官僚都要“爱民如子”的廉政蕴涵。

民本思想也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治理的转型,它的产生恰好伴随着世卿世禄制度到封建官僚制度的转变。世卿世禄制度的终结,统治主体代之以官僚集团。关于官僚政治,“从理论上讲,往往是如此的:(一)所尽的责任,减至最小限度。(二)所得的利益,扩充至最大限度。……所以怠惰和贪污,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”^{〔5〕}。“官僚和民众的利益,是处于相反的地位的。”^{〔6〕}“君主所处的地位,一方面固然代表其一人一家之私……又一方面,则亦代表人民的公益,而代他们监督治者阶级。”^{〔7〕}君主与

〔1〕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〔2〕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

〔3〕《荀子·王制》。

〔4〕《春秋繁露·为人者天》。

〔5〕《吕思勉讲中国政治》,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(下同),第211页。

〔6〕同上书,第213页。

〔7〕同上书,第236页。

民众处在利益的两极，民本思想针对的是防止中饱阶层的形成。反对中饱官僚集团欺上压下，是专制体制反腐败的重要任务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廉政意义及其局限性都在于此。

恰因如此，民本思想成为约束官僚集团政治行为的一个准绳。西汉思想家贾谊将以民为本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：“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，君以为本，吏以为本。故国以民为安危，君以民为威侮，吏以民为贵贱。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。”^{〔1〕}

在政治实践中，民本思想首先要求官吏关注民生。“夫民者，国之根也，诚宜重其食，爱其命。”^{〔2〕}凡属把发展民生作为要务的官吏都受民拥戴，也为朝廷赞赏。例如，西汉宣帝时，渤海太守龚遂赈灾民、选良吏、施教化、劝农桑，治理升平，后被《汉书》列为第一循吏。

民本思想要求官僚顺应民心、惩恶扬善。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”^{〔3〕}民众的意志彰显社会的善恶，是行政的主要依据。唐朝宰相狄仁杰为官，不媚上、不阿贵，始终保持体恤百姓的本色，做大理丞到任一年，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诸多案子，没有一人上诉伸冤，后被称之为“唐室砥柱”。

民本思想还体现于官员执政价值追求方面。北宋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^{〔4〕}，南宋陆游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^{〔5〕}，清代黄宗羲“我之出而仕也，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

〔1〕《新书·大政上》。

〔2〕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凯传》。

〔3〕《道德经·第四十九章》。

〔4〕范仲淹：《岳阳楼记》。

〔5〕陆游：《病起书怀》。

民，非为一姓也”^{〔1〕}，晚清龚自珍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^{〔2〕}，无不彰显了民本思想。

隋唐以后，民本思想通过科举制度注入政治体制之中，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特有的文化气质，形成了一股廉洁政治清流，源远流长数千年，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政治腐败现象起了抑制和延缓作用。

（二）古代的德治思想

中国古代的德治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。尧舜禹是部落首领，更是道德楷模，他们和睦群体，禅让而治。家天下开始后，夏商周三代统治集团很快认识到要“敬德、保民、配天”。

在春秋争霸的战火中，思想家疾呼德治。一方面是道家消极的德治，一方面是儒家积极的德治。老子提倡统治者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^{〔3〕}，施行无为而治，薄税敛、轻刑罚、慎用兵、尚节俭。孔子反对暴虐政治和不义之战，明确提出了“为政以德”的主张。他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（同‘拱’）之。”^{〔4〕}如何为政以德？孔子认为包括仁政与礼治两个方面，其中前者为本，后者为辅。仁是出发点，即律己宽人的“忠恕”之道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^{〔5〕}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^{〔6〕}。治是归宿，就是要“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

〔1〕《明夷待访录·原臣》。

〔2〕龚自珍：《己亥杂诗》。

〔3〕《道德经·第十九章》。

〔4〕《论语·为政》。

〔5〕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〔6〕《论语·颜渊》。

以时”^{〔1〕}，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^{〔2〕}。

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，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，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^{〔3〕}因此，要顺民意、体民情、殖民产。荀子要求以政惠民、以德导民、以礼齐民，尤其要讲究礼乐法度，“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、倾覆、幽险而亡。”^{〔4〕}

秦统一了中国，但是迅速灭亡了。许多政治家、思想家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违背了德政，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^{〔5〕}。汉初大兴德政，倡导黄老无为之治，令民休养生息。汉武帝开始崇尚积极进取的儒学，德治进一步转型。董仲舒意识到君主统治集团权力日益强大，难免造成政治混乱与倾覆，于是在理论上提出一定要加强道德修养，依靠德治管理国家。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学说，为德治提供理论依据。“天之任阳不任阴，好德不好刑”^{〔6〕}，“天之生民，非为王也，而天立王以为民也。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，天予之；其恶足以贼害民者，天夺之。”^{〔7〕}“国之所以为国者，德也”，“是故为人君者，固守其德以附其民”^{〔8〕}。“君民者，贵孝弟而好礼义，重仁廉而轻财利，躬亲职此于上，而万民听，生善于下矣。”^{〔9〕}而一旦君主滥用权力，有背天道，就会遭到“天谴”。从此之后，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道德教化对于

〔1〕《论语·学而》。

〔2〕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〔3〕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。

〔4〕《荀子·强国》。

〔5〕贾谊：《过秦论》。

〔6〕《春秋繁露·阴阳位》。

〔7〕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，汤武不专杀》。

〔8〕《春秋繁露·保位权》。

〔9〕《春秋繁露·为人者天》。

管理国家“如鸟有翼，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”^{〔1〕}的作用。

宋朝重文治，“理学”应运而生，德治从理论到实践上升为治国轨度。理学认为，君主的个人品行是治乱兴衰的根本原因，君主要“正心诚意”，通过修德以正心去实施仁政，恤民养民，尽量避免耗用民力，使民安于生产，满足人民的衣食之需，进而达到修礼义、尊君亲。官吏要爱民，民为邦本，爱民就是爱君。在形式上要以礼治国，德是礼的根本，礼是德的制度表现，要通过礼治协调社会关系，完善社会等级秩序。

明末清初，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，批判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宋明理学，提出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德治思想，主张劝学和奖廉，通过正人心、厚风俗、行孝悌、倡廉耻，促进克己奉公，实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德治理想。

中国几千年历史，德治是基本一贯的政治主张，因此在为政道德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源。例如，孔子提出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“五美”即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”。“四恶”即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”^{〔2〕}。汉代扬雄提出：“君子为国，张其纲纪，谨其教化。导之以仁，则下不相贼；莅之以廉，则下不相盗；临之以正，则下不相诈；修之以礼义，则下多德让。”^{〔3〕}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经验编写成的《贞观政要》和《帝范》，其中不少涉及帝王

〔1〕《贞观政要·慎所好》。

〔2〕《论语·尧曰》。

〔3〕《法言·先知卷第九》。

修养问题。武则天编《臣轨》专辟“廉洁”一章，论及廉洁的重要性：“君子虽富贵，不以养伤身；虽贫贱，不以利毁廉。……廉平之德，吏之宝也。”〔1〕欧阳修则提出：“廉耻，士君子之大节，罕能自守者，利欲胜之耳。”〔2〕南北朝时期苏绰提出君主必须具备八种品德：“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，躬行仁义、躬行孝悌、躬行忠信，躬行礼让，躬行廉平，躬行俭约，然后继之以无倦……加之以明察。”〔3〕北宋司马光则提出：“人君大德有三，曰仁，曰明，曰武。”〔4〕南宋朱熹提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“正心诚意”〔5〕。康熙撰《廉静论》，论述“吏尤以廉为贵也”〔6〕。

为政道德思想，一方面针对君主，一方面针对官僚。君主道德修养由“天”管辖，官僚的道德修养则付诸考课制度。比如，唐代文官考课制度的标准是“四善二十七最”。其中，二十七最强调官吏的为政才能，四善则突出官吏的道德修养。“凡考课之法有四善：一曰德义有闻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称，四曰恪勤匪懈。”〔7〕明清文官考核制度规定有“四格”和“八法”的内容。四格“才、守、政、年”之中的操守就是对道德方面的要求，八法“贪、酷、罢软无为、不谨、年老、有疾、浮躁、才力不及”之中的不谨、浮躁、贪、酷四项也主要是指官员道德方面的缺陷和错误。

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政治家还提出一些方法，用来修养德性，

〔1〕 武则天：《臣轨·廉洁章》。

〔2〕 《欧阳修集·笔说·廉耻说》。

〔3〕 《北史·苏绰列传》。

〔4〕 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五十九》。

〔5〕 《宋史·道学（三）》。

〔6〕 《康熙御批·廉静论》。

〔7〕 《唐六典·尚书吏部》。

直至仕进。如儒家经典《大学》讲三纲八目，阐述不断加强个人修养，强调通过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完善内在的德智修养，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，实现外在事业的完成。

（三）古代的任贤思想

任贤使能，或者说“尚贤”、“任贤”，是古代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贤”，本义指“多才”，但依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论，“贤”等同于“善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中讲：“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，鄙人必取百金矣；以和氏之璧、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，贤者必取至言矣。”^{〔1〕}可以看出，贤人首先是有道德的人。它的反义词是“不肖”，如果是自谦，就是“不才”的意思；如果他指，就是“品行不端”。正是“贤”的双重含义，任贤总的要求是重用优异之人。

周文王和姜太公讨论圣贤之君的治道，姜尚列出的第一条就是“上贤，下不肖”^{〔2〕}。后来周公旦摄政，思贤若渴，礼贤下士，“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士”^{〔3〕}，传为历史美谈。

春秋列国争霸，贤人政治备受推崇。打破贵贱出身的社会偏见，不拘一格选用贤人，成为一条重要的治国经验。齐桓公曾问郭国父老亡国之因，父老回答说：“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，恨坏人而不翦除，所以导致亡国。”齐桓公深受启发，重用鲍叔牙荐举的

〔1〕《吕氏春秋·异宝》。

〔2〕《太公六韬·文韬·上贤》。

〔3〕《韩诗外传》卷三。

管仲为相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^{〔1〕}，遂成霸业。而晚年任用了易牙、开方、竖刁之类的奸佞，结果导致身死国衰。管仲树立贤人伟业，孔子评价道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！”^{〔2〕} 鉴于此，孔子力主“举贤”。在回答鲁哀公治乱问策时，他说：“政在选贤”^{〔3〕}；在回答仲弓关于为政之要时，他说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”^{〔4〕}；在谈大同理想时，他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^{〔5〕}。孟子主张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”^{〔6〕}，他所提出的可致“无敌于天下”的五项国策中，第一项即为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”^{〔7〕}。荀子也高度推崇“尚贤使能”，将“贤能不待次而举，罢不能不待须而废”列为“王者之政”^{〔8〕}。荀子还讲：“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，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，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，是君人者之大节也。三节者当，则其余莫不当矣；三节者不当，则其余虽曲当，犹将无益也。”^{〔9〕}

墨子曾经系统论述“尚贤”的思想。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，“尚贤者，政之本也”。他强调“贤”是选官的唯一标准，其他如身份、地位、职业等等社会因素都不可影响人才的使用。“故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

〔1〕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。

〔2〕《论语·宪问》。

〔3〕《韩非子·难三》。

〔4〕《论语·子路》。

〔5〕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〔6〕〔7〕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〔8〕〔9〕《荀子·王制》。

令……故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”任贤的标准有三条，凡“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者”，就要量才而任用，量功而分禄。^{〔1〕}

法家选官突出“能”而重“事功”。李悝提出“为国之道，食有劳而禄有功，使有能而赏必行、罚必当”^{〔2〕}，申不害提出“见功而与赏，因能而授官”^{〔3〕}，商鞅提出“国以功授官予爵”^{〔4〕}，韩非子提出“推功而爵禄，称能而官事”^{〔5〕}，这些思想都属于任贤范畴。

任贤思想，强烈地冲击腐败的世卿世禄制度，推出了一批批崛起自社会各阶层的士官将相，推动了由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进程，并最终将任贤思想制度化。汉武帝建立察举征辟制度，就是选贤的一种制度化。董仲舒说：“使诸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，且以观大臣之能；所贡贤者有赏，所贡不肖者有罚。……遍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盛易为，而尧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为功，实试贤能为上，量材而授官，录德而定位，则廉耻殊路，贤不肖异处矣。”^{〔6〕}

隋唐兴起科举制，进一步将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起来，任贤使能成为国家意志。史载唐太宗为网尽天下贤人而欣欣然，“尝私幸端门，见新进士缀行而出，喜曰：‘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！’”^{〔7〕}

科举制度的廉政意义就在于把民间贤俊选拔到官僚集团中来，

〔1〕《墨子·尚贤上》。

〔2〕《说苑·政理》。

〔3〕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。

〔4〕《商君书·靳（饬）令》。

〔5〕《韩非子·人主》。

〔6〕《天人三策·第二策》。

〔7〕王定保：《唐摭言·述进士上篇》。

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腐败发生。唐宋以来，中国逐渐形成一个地道的“士人政府”，形成“道统”对政统的完善与制衡。以范仲淹为例，朱熹曾高度评价其从政意义，他说：“且如一个范文正公，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，无一事不理会过。一旦仁宗大用之，便做出许多事业。”^{〔1〕}今人余英时也认为，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典范，代表北宋以来士阶层的共识^{〔2〕}，这就是“先王建官，共理天下，必以贤俊授任，不以爵禄为恩，故百僚师师，各扬其职，上不轻授，下无冒进，此设官之大端也”^{〔3〕}。由此说明，宋代以降，“‘士’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，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；‘以天下为己任’便是其最显著的标识。”^{〔4〕}

士人代表文化的力量，文化蕴含着道德和智识的力量。有宋开始，选贤任能更加强调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。司马光对此作了透辟的阐述。“夫才与德异，而世俗莫之能辨，通谓之贤，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……才德全尽谓之‘圣人’，才德兼亡谓之‘愚人’；德胜才谓之‘君子’，才胜德谓之‘小人’。凡取人之术，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，与其得小人，不若得愚人。何则？君子挟才以为善，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；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胜，譬如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

〔1〕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二九。

〔2〕余英时：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，三联书店2004年版（下同），第210页。

〔3〕《范文正公文集》卷七《奏上时务书》。

〔4〕余英时：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总序，第3页。

以决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，其受害岂不多哉！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；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馀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”〔1〕司马光的论述影响深远。

康熙曾经感言道：“国家用人，当以德器为本，才艺为末。凡才长者，虽能济事，亦为败检。若德器醇朴，必不至荡轶准绳之外。”〔2〕道德是内心的法则、自律的防线，道德高尚，必至清廉。

（四）古代的吏治思想

官吏是执掌权力的管理集团，是腐败易发常发之处，所以，治国必先治吏。

尧舜之时就注意对官吏严加考课，严明赏罚。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庶绩咸熙。”〔3〕尧之“鞭作官刑”，舜之“流刑”，都是用来惩戒犯错误官吏的。商朝“制官刑，儆于有位”，惩治官吏“三风十愆”腐败行为。〔4〕盘庚也曾告诫群臣，不要斤斤计较升官发财，而要专心关注民生和教化。〔5〕西周“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”〔6〕，标准是“六廉”，奖惩的方式有爵、禄、予、置、生、夺、废、诛等。周朝制《吕刑》，判定罪与罚有“五刑”、“五罚”、“五过”、“五疵”的等级。〔7〕

春秋战国时期，世卿世禄制度逐步被官僚制所取代。君主通

〔1〕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一》。

〔2〕《圣祖御制文》二集卷三十八《张华以才学文识名重一时》。

〔3〕《文献通考·选举十二》。

〔4〕《尚书·伊训》。

〔5〕《尚书·盘庚》。

〔6〕《文献通考·选举十二》。

〔7〕《尚书·吕刑》。